

各阶段升学机会及影响因素

——从小学到大学的升学路径

李春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教育不平等问题是社会分层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因为教育机会在人口中的分配模式是影响社会分层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教育机会分配的平等程度也是衡量社会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在任何一个社会，教育机会的分配都不是绝对平等的，某些群体享有较多的教育机会而另一些群体则拥有较少的机会。家庭的出身背景，以及其它一些社会分割因素——如种族、民族、性别或移民身份，都可能影响个人的教育机会。这些方面的不平等会持续地维持不变，还是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变化的趋势是线性地上升或下降，还是呈现波浪式的曲线？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都是学者们想要回答的问题。在相关研究领域，研究者最关注的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如工业化水平）和教育规模扩张是否会带来教育不平等的下降？而目前未无定论。

就中国的情况来说，1949年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教育规模持续扩张，教育机会的数量不断增长，但教育不平等程度并未表现出持续下降的态势。近60年里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教育发展策略也有重大改变，这些变化对教育不平等状况产生了重要影响。工业化推进、教育扩张和国家政策变化三重因素的交叉作用，使中国的教育不平等变化趋势变得更加复杂。另外，在不同时期，国家政策对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策略有所不同，从而导致不同阶段的教育不平等程度的变化也有所不同。

为了全面考察中国教育不平等的变化状况，深入解释导致变化的原因，本文采用2006和2008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系统分析由小学至大学的各阶段升学机会的不平等情况，着重考查影响各阶段升学机会的家庭背景因素，以及在各级教育迅速扩张时期这些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并检验工业化假设、再生产假设和文凭主义假设，解释工业化、教育扩张和国家政策变化如何影响教育不平等。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际社会学研究领域，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至今，有大批学者对各阶段教育不平等及年代变化趋势进行了理论的和经验层次的研究分析，而近 20 年来的研究重点是，在教育扩张的大背景之下，家庭的阶级地位和文化资本等家庭背景因素以及社会结构性分割因素（如种族\民族），对教育机会的影响作用是否发生了变化，是否导致了教育不平等的下降或维持不变。研究者们主要围绕着三种理论观点展开争论。

第一种理论是工业化理论（industrialization thesis），研究者称其为工业化假设。这种理论预测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家庭背景及其它先赋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逐步减弱，而教育机会竞争将越来越取决于自致因素，从而导致教育机会不平等程度下降。工业化理论的支持者认为，除了原始社会——那时劳动分工不那么细而且是以年龄资历或性别来分工，在其它所有社会，职业都是分层系统的基础，尤其在工业化社会，劳动分工细化和专业化，以职业的专业技能要求高低而形成了一种职业分层，人们的职业位置决定了其社会经济地位，而职业位置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教育水平，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与其社会经济地位回报之间紧密相联。基于工业化社会的功能要求——需要越来越多的拥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去担当相应的职业位置，教育系统不断扩张，并成为把人们分配到各种工作岗位的一种机制（Lenski 1966; Treiman 1970）。在工业化社会，当人们的教育水平逐步提升时，学历文凭成为一种主要的职业位置分配的屏障机制。进一步来说，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教育机会越来越取决于自致因素（勤奋努力和聪明才智）而不是先赋因素（家庭背景或性别、年龄、种族等先天因素）。因此，工业化理论的结论是，教育机会越来越平等化——指越来越不依赖于家庭背景和先天因素。

第二种理论是再生产理论。与工业化理论相反，再生产理论（Collins 1971）对于教育提供工作技能的作用则不那么重视。再生产理论家所强调的是教育的另一种功能，他们认为，在职业分层过程中，教育的功能是把中下阶层人群排挤到较低等级的职业位置上。具有优势地位的社会群体或阶层，通过制定学校教育的制度安排（如升学考试、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及学习规则等），以及向子女提供

各种资源帮助其适应学校教育环境，使自己的子女在教育机会竞争中获得成功，而来自于较低社会阶层和弱势群体的人，由于没有父母的帮助和家庭资源的支持，往往在教育机会竞争中被淘汰出局。同时，在劳动力市场中，具有文化资本优势的社会群体通过以教育水平为基础的职业筛选和分配机制保持着霸权和特权（Bourdieu 1977; Bowles and Gintis 1976; Carnoy 1974; Collins 1979）。再生产理论家指出，教育实际上再生产了原有的阶级地位和分层系统，上层阶级的子女通过教育获得了较高的阶级地位，而中下层阶级的子女因为失去教育机会而只能就任于较低的阶级地位，通过教育系统，阶级地位在代际之间进行传递。在教育不平等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假设——MMI 假设——就是源于再生产理论，MMI 假设认为，无论如何增加教育机会，只要中上阶级或优势地位群体未达到教育饱和，阶级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就会维持不变（参见李春玲 2010）。

第三种理论是文凭主义假设（credentialism hypothesis）。文凭主义是指人们依赖于某种资格证书而获得特定的工作岗位和社会地位。在劳动力市场中，雇主往往根据受雇者的学历文凭判断其是否适合某种工作岗位，高学历的人因而可以获得较高经济报酬和较高声望地位的职业岗位。为了追求较好的职业和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人们对人力资本进行大量投资以获得较高的学历文凭。这导致了整个社会崇尚学历文凭。文凭主义假设所涉及的就是这种文凭主义倾向对教育机会不平等所产生的影响。这一理论假设也源于再生产理论。再生产理论家虽然强调教育作为阶级地位再生产的功能，但同时也意识到，学校教育的社会化功能与社会排斥作用（再生产功能）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冲突。一方面，学校教育作为一种有效的机制，可以使中下层群体的子女获得社会化而融入主导性的价值规范体系。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群体的代表们对政府施加压力以扩张教育体系并吸纳更多的中下层群体的子女——如少数民族或工人阶级。教育扩张的压力与中下层群体不断增加的融入学校教育体系的要求相一致，其结果是初等教育和初级中等教育机会不断增加，并且逐步达到普及。因此，初等教育甚至中等教育的获得越来越独立于家庭背景和先天社会因素，其平等化水平逐渐提高。但另一方面，中上层群体想要维持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优势，就必需保持他们在高等教育中的优势。他们用各种方式让中下层群体的子女远离高等教育，比如增加非学院式教育机会（如职业教育、技术学校、社区大学等）、提高大学入学标准

或者提升大学学费 (Karabel 1972; Shavit 1984)。因此, 要获得真正对劳动力市场有影响作用的学历文凭, 家庭背景还是有影响的, 尽管整体上的教育机会在趋于平等化。文凭主义假设预测家庭背景对较低层次的教育获得的影响逐步下降, 但对较高层次的教育获得 (比如上大学) 的影响则保持稳定或有可能上升。

欧美国家的一些学者采用调查数据对工业化假设和文凭主义假设进行了检验。在美国, Featherman and Hauser (1978) 通过年龄组比较分析, 发现家庭背景和先天社会因素对初等和中等教育获得的影响在下降, 但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则没有下降。由于农民及传统的弱势群体的子女大批进入初等和中等教育, 在这两个层次的学校教育中平等程度上升, 但是在高等教育中, 中上层阶级仍然保持着优势地位。在英国, Halsey (1975) 也观察到父亲职业地位对儿子的教育机会的影响在减弱。然而 Halsey, Heath, and Ridge (1980) 的研究则显示家庭和社会背景对教育获得仍有强烈影响。Haller (1981) and Muller (1979) 分析了奥地利和西德的调查数据, 也发现家庭和社会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呈下降趋势 (转引自 Shavit 1990)。在匈牙利, Simkus and Andorka (1982) 的研究发现, 家庭背景对初等教育机会的影响减弱, 但对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影响没有下降。在法国, Garnier and Raffalovich (1984) 的研究则发现家庭背景及先天因素的影响保持稳定水平而没有下降。

1981 年美国社会学家 Mare (1981) 发表了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 通过统计模型的改进纠正了以前的研究结论, 并推进了这一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深入。Mare 认为, Featherman and Hauser (1978) 的研究所发现的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下降, 可能是由于不同年龄组教育水平的边际分布效应的作用, 由于教育扩张和教育机会增加, 不同年龄组的教育水平分布不同, 越年轻的年龄组受教育水平越高。这一因素可能干扰了研究结论。Mare 设计了一种升学模型 (transition Model), 采用 Conditional Logit Regression, 把年龄组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 从而控制了教育水平边际分布的作用, 并通过年龄组与各个自变量的交互作用项来考查家庭背景因素作用的年代变化, 其结果发现家庭背景因素的作用不但没有下降而且上升了。在以色列, Shavit (1990) 采用同样方法, 对以色列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即: 家庭背景及先天因素的影响并没有明显下降。Smith and Cheung (1986) 也采用这种方法对菲律宾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其结果也显示家

庭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没有下降。

国内学者对中国教育不平等及其年代变化趋势进行了一些研究分析(李春玲 2010; 2009; 2003; 刘精明 2008; 2005; 李煜 2006), 这些研究发现, 在经济改革之前的 20—30 年里, 教育机会不平等有所下降, 而经济改革开始以后的 1980 年代和 1990 年教育机会不平等明显上升(李春玲 2003, 李煜 2006), 同时, 研究还发现, 由于政策干预和结构变化, 不同类型的家庭资源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有所不同(刘精明 2008)。另外, 刘精明(2008)和李煜(2006)的研究也考虑了不同升学阶段的教育不平等及其影响因素, 并发现父母文化资本对于不同阶段的升学机率影响不同。国内学者的研究较少验证工业化理论假设, 而是重点考查重大的政策变化和制度变迁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 大多数研究比较了改革开放之前与之后的变化。对于最近十年来, 特别是大学扩招政策实施之后, 各阶段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研究较少。

二、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

本文的研究采用 Mare (1981) 升学模型 (transition Model), 即把年龄组变量加入多阶段升学模型 (Conditional Logit Regression), 控制不同年代教育机会供给量变化的边际效应, 准确估计家庭背景和社会结构因素对各阶段教育升学机会的影响及其年代变化, 由此判断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同时, 在理论层面, 验证工业化假设、再生产假设和文凭主义假设。

根据工业化理论、再生产理论和文凭主义理论这三种理论观点, 我们可以分别提出以下三个假设:

1a. (工业化假设): 随着工业化水平提高和教育规模扩张, 各个阶段的教育机会不平等逐步下降, 家庭背景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逐步减弱。

再生产假设及 MMI 假设主张, 如果社会结构中的阶级不平等持续存在, 那么教育机会不平等也将维持不变, 家庭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不会减弱, 只有某一阶段的教育达到饱和 (85% 以上的中上阶层家庭子女都能接受这一阶段的教育), 此阶段的教育不平等才会下降。

1b. (再生产假设/MMI 假设): 1960 年代以后初等教育机会不平等下降 (初等教育在 60 年代逐步普及); 70 年代以后初级中等教育机会不平等下降 (初级

中等教育); 而高级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机会不平等将维持不变, 家庭背景因素对这两个阶段的教育获得的影响没有减弱。

1c. (文凭主义假设): 随着工业化水平提高和教育规模扩张, 初等教育和初级中等教育机会不平等逐步下降, 而高级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维持不变, 家庭背景因素对这两个阶段的教育获得的影响没有减弱。

国外学者在讨论家庭背景及结构因素对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影响时, 主要考虑工业化过程及随着工业化推进而来的教育扩张因素的影响, 然而, 中国的情况要比其他国家复杂, 中国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变化趋势不仅受到工业化和教育扩张的影响, 而且还受到政府重大政策改变的影响——实施经济改革以及由强调阶级平等转向追求经济增长的政策目标, 政府重大政策改变还导致了阶级阶层结构的巨大变化, 这也对教育机会不平等产生了影响。实际上中国的教育不平等的趋势变化受到三种宏观因素——工业化进程、教育扩张速度和国家层面的社会政治变迁——的交互影响。在过去的 60 年里, 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变, 从而导致社会结构和阶级不平等的极大变化——这一点与大多数西方社会有所不同。1949 年之前, 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社会, 存在着极大的阶级差异和教育不平等。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 共产党政府推行均等主义政策, 阶级结构发生改变, 阶级差异明显缩小。政府在教育领域也实施相应的均等主义政策, 采取多种手段缩小教育机会的阶级差异。1978 年开始的经济改革以及相应的教育改革, 使均等化教育模式转变为精英化教育模式, 这一改革对教育不平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考虑到这些社会政治环境和国家政策变化, 中国的教育不平等变化趋势不应该是单一方向的变化或一直维持不变, 而应该是有所波动的曲线变化。因此, 对应三种理论的假设应该做如下变化。

2a. (工业化假设): 教育不平等总体上显示下降趋势, 但受国家政策影响, 1950—1970 年代下降程度较大, 1980 年代以来下降程度较小。

再生产理论和 MMI 假设认为教育不平等程度之所以维持不变, 是因为社会结构中的阶级不平等保持不变, 这意味着, 如果社会结构中的阶级差异扩大或缩小, 教育不平等也应扩大或缩小。中国社会的阶级不平等的变化有两个转折点, 1949—1978 年和经济改革的最初十年 (1980 年代) 阶级不平等下降, 而 1990 年代以来, 阶级不平等程度上升。因此教育不平等也应该随之先下降后上升。

2b. (再生产假设/MMI 假设): 教育不平等的变化趋势随着阶级不平等的变化而上下波动, 1950—1980 年代教育不平等下降而 1990 年代以来教育不平等上升。

3c. 初等教育和初级中等教育不平等下降, 而高级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不平等上升。

三、研究方法和数据

本文所用调查数据来自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开展的 2006 和 2008 年度“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GSS, CASS)。这是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 其中包括了个人教育和家庭背景信息。两次调查基于相同的抽样框, 采用分层多阶段抽样方法, 共采集到了覆盖全国 28 个省市区 130 个县(市、区)、260 个乡(镇、街道)、520 个村/居委会的 7200 余家庭户, 抽取 18—69 岁年龄段的人为被访对象。2006 年的调查获得的有效样本为 7063, 2008 年的有效样本为 7139。

本文所用数据是把 2006 年和 2008 年调查数据加以合并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数据集。因两次调查都采用了相同抽样方案, 两次调查都具有全国代表性, 两次调查的样本量几乎相同, 而且两次调查的相隔时间很短, 从而合并后的调查数据可以作为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合并数据共获得 14200 个样本。为了进行年代比较, 本研究区分了 5 个年龄组人群: 1940—1949 年出生年龄组, 1950—1959 年出生年龄组, 1960—1969 年出生年龄组, 1970—1979 年出生年龄组, 1980—1989 年出生年龄组。本研究在 14200 个样本中选取 1940—1989 年出生的人, 符合条件的共有 13796 个样本。本研究即以这 13796 个样本调查进行分析。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列在表 1 中。

表 1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 (N=13796)

变量	比例 (%)	变量	比例 (%)
性别 (男性)	47.6	父亲职业%	
本人受教育程度*		管理人员	3.6
未上过学	11.1	专业技术人员	4.0
小学	27.2	办事人员	7.1
初中	40.3	个体\自雇	1.7
高中/职高/中专/技校	14.5	工人	19.1

大专	4.5	农民	64.5
大本	2.2	父亲教育水平%	
研究生及以上	0.2	未上学	43.4
年龄组%		小学	33.2
1940—1949	15.3	初中	14.9
1950—1959	23.5	高中及以上	8.5
1960—1969	30.2	父亲户口（城镇）%	27.8
1970—1979	20.6		
1980—1989	10.4		

*原数据中接受调查者的教育程度分布有所偏误，笔者根据 2005 年 1% 人口抽样数据的人口教育程度分布对原数据进行加权调整，表中所列“本人受教育程度”的比例是加权数据的计算结果。未加权数据的教育分布：未上学 18.3%，小学 23.7%，初中 31.3%，高中/职高/中专 17.4%，大专 5.7%，大本 3.3%，研究生 0.3%。

四、中国教育扩张及教育机会增长

自 1949 年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的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教育规模和教育机会都得到了极大得提高。解放前中国的教育事业非常落后，全国人口中 80% 以上的人是文盲，农村人口中文盲比重更大。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仅在 20% 左右。1947 年全国高等学校在校生共 15 万人，1946 年中等学校在校生共有 179.8 万人，小学在校生 2285.8 万人，若按当时全国 4.7 亿人口计算，平均每万人口中仅有高等学校学生 3 人，中等学校学生 38 人，小学生 486 人（陆学艺、李培林 1991 第 210 页）。然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人的教育机会大提高。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 年全国每万人中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有 873 人，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有 3721 人，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有 3792 人，小学文化程度的人 2618 人。

图 1 列出了 1952 年以来的各阶段升学机率。虽然总体教育机会一直保持增长，但由于政府政策的影响，在不同时期，中国的教育机会增长有所波动。建国最初 20 年（19 世纪 50 和 60 年代）基础教育和初级中等教育发展很快。1952 年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为 49.2%，即仅有大约半数的小学学龄儿童能进入学校读书，到 1965 年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猛增至 84.7%，到 1975 年小学教育已经基本普及（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96.8%）。1957 年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的比例为 44.2%，至 1965 年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的比例猛增至 82.5%，1975 年初

中教育接近普及（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的比例达到 90%）。高级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 50 和 60 年代虽然也获得了发展，但原有基础较差，能够上高中和大学的人仍为少数。1966—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对高级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冲击很大，这一期间，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和整顿，导致教育系统出现混乱，教育发展出现停滞。初中毕业生升学率波动剧烈，1962 年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的比例仅为 30%，而短短三年之后，1965 年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的比例猛增至 70%，五年之后，1970 年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的比例又猛跌至 38.6%，1975 年又回升到 60.4%，1978 年又跌至 40.9%。高等教育的状况也极为混乱，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期间，全国砍掉 106 所普通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大批校舍被占，教学仪器、设备、图书资料被严重毁坏，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1976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政府的教育政策出现了重大改变。1977 年，全国高等学校恢复了停顿 10 年之久的统一招生考试制度。高考制度的恢复标志着中国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理念的转变，由此开始中国的教育体制越来越围绕着一套系统的考试制度而运转，整个教育系统逐步演变为一种严格的、逐级升学的考试体系，学校教育实际上成为精英人才的选拔机器，通过逐级升学考试制度的层层筛选，成功通过筛选的人因拥有较高学历文凭而获得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在筛选过程中被淘汰的人则较少有机会进入社会的中上层。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劳动力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文凭主义倾向的增长，教育促进社会公平的功能逐步弱化，而教育的社会分层功能越来越强化。

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政府不断增加对教育的投入，教育设施不断改进，教育质量明显提高。不过，教育机会的增长还是有所波动。经济改革的最初十年，中学阶段教育机会持续下滑。1975 年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的比例已达到 90.6%，而 1978 年则下降到 87.7%，1980 年下降到 75.9%，1986 年进一步下降到 68.4%。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也显示出相同下滑趋势，1975 年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的比例为 60.4%，1978 年猛然降至 40.9%，1980 年略有回升为 45.9%，但之后继续下降，1985 年为 41.7%，1986 年为 40.6%，1987 年为 39.1%，1988 年为 38%，1989 年为 38.3%。导致中等教育机会下滑的主要原因是教育系统的市场化（学费及相关费用上涨）、社会控制系统的放松（户口制度松动而农村人外出打工）以及经济领域的市场化（个体

私营经济及其雇工出现), 这些因素导致许多农村贫困家庭的子女放弃中等教育机会而外出打工挣钱,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大量的童工现象。

1990 年以后, 由于政府实施的一些措施, 尤其是“希望工程”对贫困失学儿童的救助, 以及劳动力市场的一些变化(如大批青壮年农民工进城打工而对童工需求下降)等, 中学阶段的辍学现象得到部分控制, 中等教育机会会有所回升(参见图 1 和图 2)。新一轮机会增长是从 1990 年开始的, 到 1994 年前后, 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开始恢复到 1978 年的水平。从总体趋势看, 1990 年代以来, 基础教育、中等教育机会供给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到 2000 年, 全国基本上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工作, 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初中毕业升学率超过 50%, 高中毕业升学率达到 73.2%。高等教育机会在 90 年代增长缓慢, 直到 90 年代末期政府推行大学扩招政策, 高等教育机会才出现迅猛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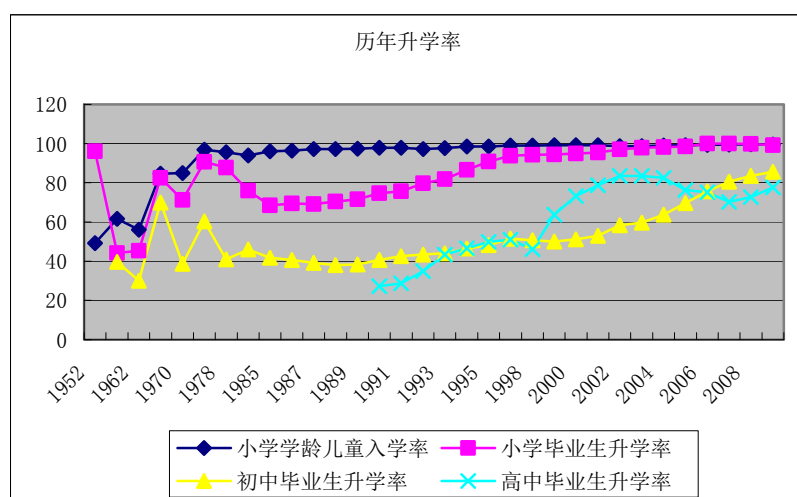


图 1 1952—2009 年各阶段升学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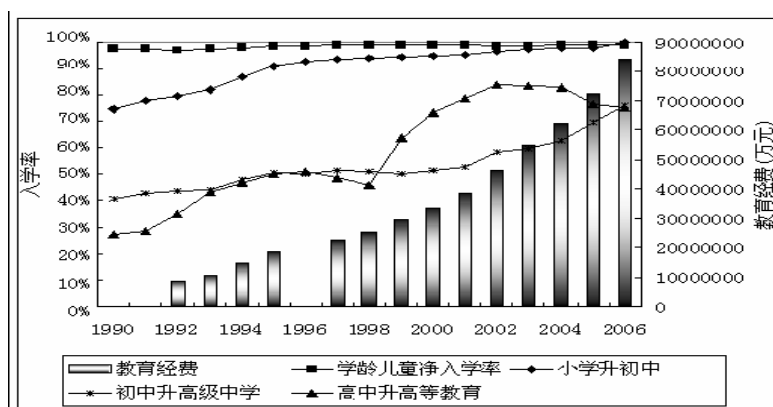


图 2 教育经费和各级学校入学率

1999 年中国政府采取了大学扩招政策，高等教育规模急速扩张，高等教育机会迅速增长（参见图 3）。在随后的 5 年里（大学扩招政策实施期间），中国高校招生人数以年均 20% 的幅度增长。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的比例从 1998 年的 46.1% 猛增至 2003 年的 83.4%。2005 年（扩招政策的顶点），全国普通高校招生人数是 1998 年的 4.7 倍，高校毛入学率达 21%，在校生人数是 1998 年的 4.6 倍。2006 年以来，由于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突出，高校扩招幅度放缓，但仍维持约 5% 的增长幅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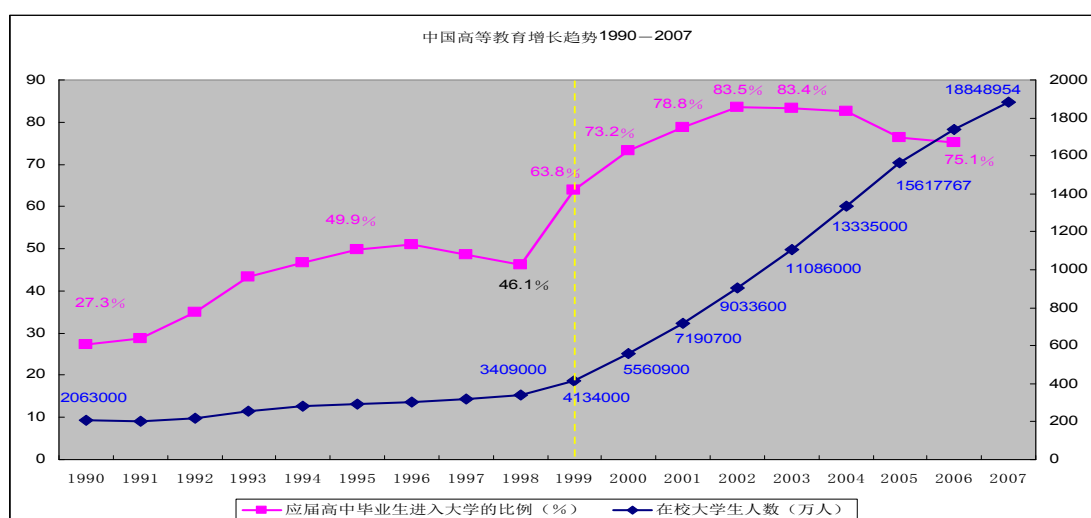


图 3

五、各阶段升学机率及年代比较

教育发展水平的年代差异以及政府教育政策的变化，使不同出生年代的人拥有不同教育机会，每一代人的升学机率和升学路径也有所不同。在我们所调查的 13796 个 1940—1989 年出生的人群中（参见图 4），接近 90% 的人（88.9%）进入了学校教育系统接受正式教育，而其余的 11.1% 则被排斥于正式教育之外。进入正规学校教育系统的 12259 人中，有 30.6% 的人只接受了小学教育即离开了学校，其余的 69.4% 的人继续升学。升入初中的 8512 人当中，又有 65.4% 的人在初中阶段或初中毕业后离开学校，只剩 34.6% 人继续升入高中。在升入高中的 2947 人当中，又有超过三分之二（67.8%）的人在高中阶段或高中毕业后（包括中专和职业学校）离开学校，最终只有 32.2% 的继续升学进入大学。如果按照 13796 人的总体计算，仅有 6.9% 的人（949 人）通过了各阶段的升学关卡，最终争取到了高等教育的机会，而其余的 93.1% 的人则在层层筛选过程中被逐步淘汰，失去了获取高等教育的机会。

图4 升学路径图（1940—1989年出生人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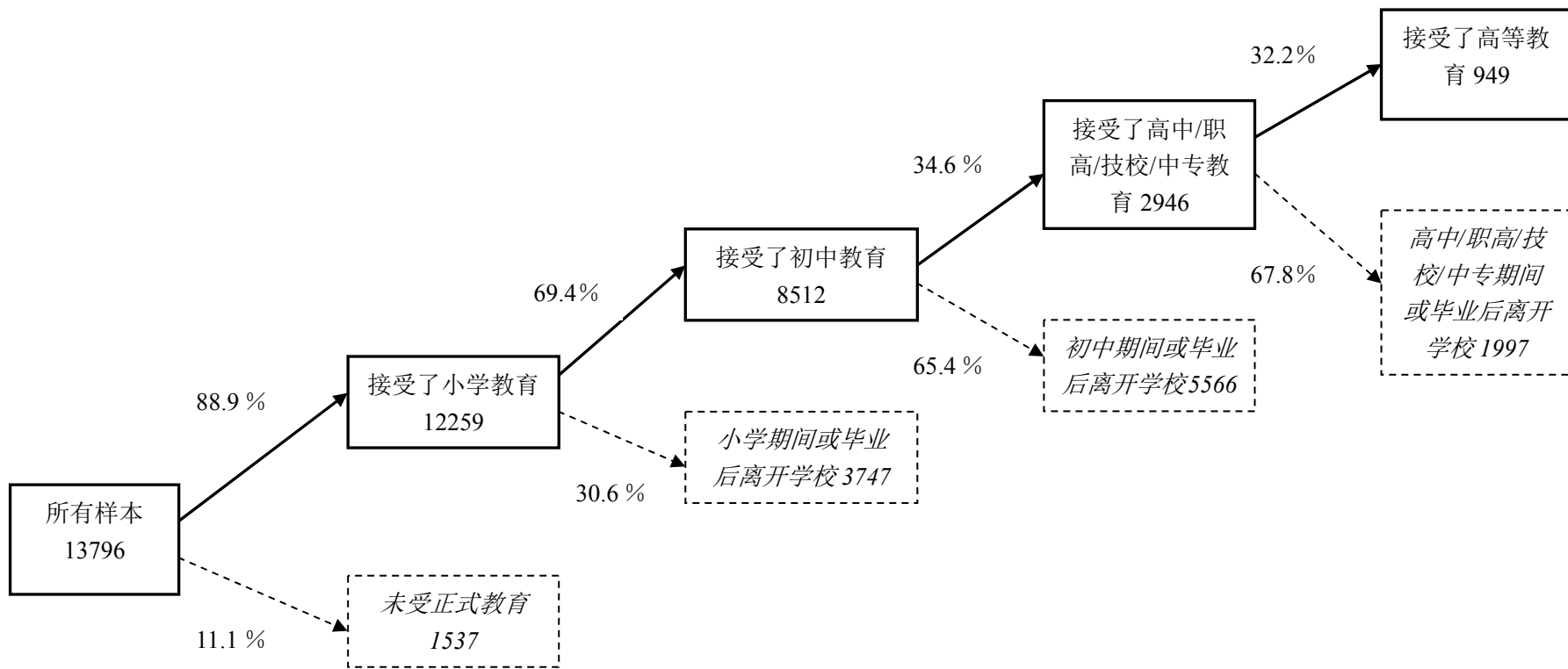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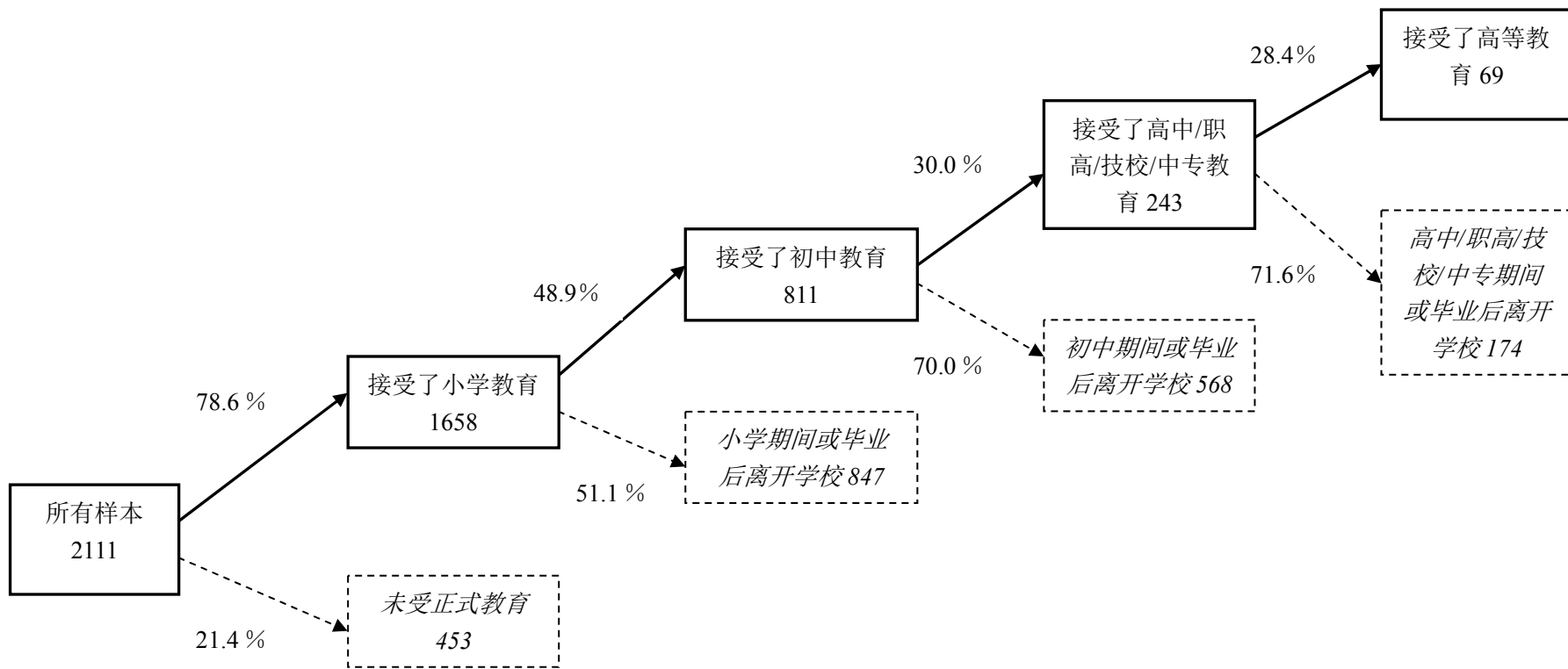


图5 升学路径图（1940—1949年出生人群）



历史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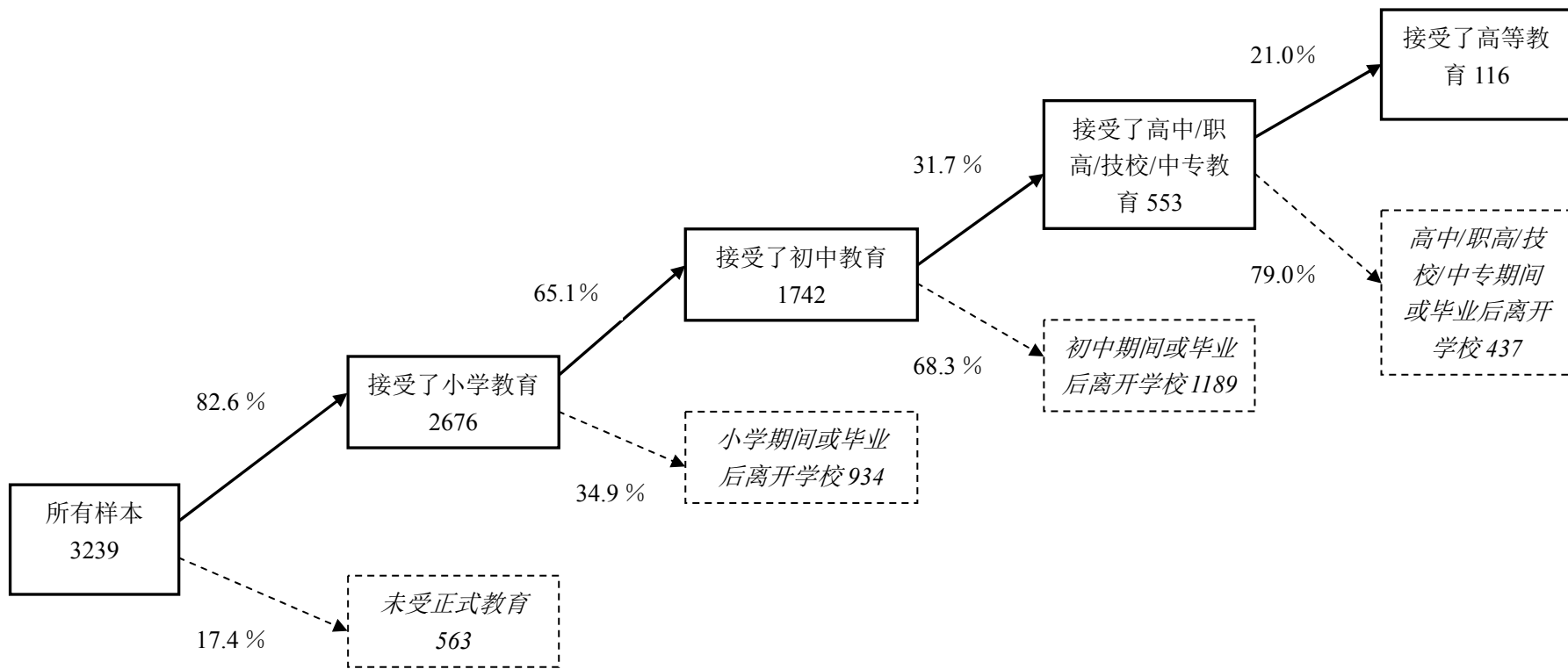
40年代末期至50年代
解放初期

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
社会主义建设运动

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

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
文革初期

图6 升学路径图（1950—1959年出生人群）



历史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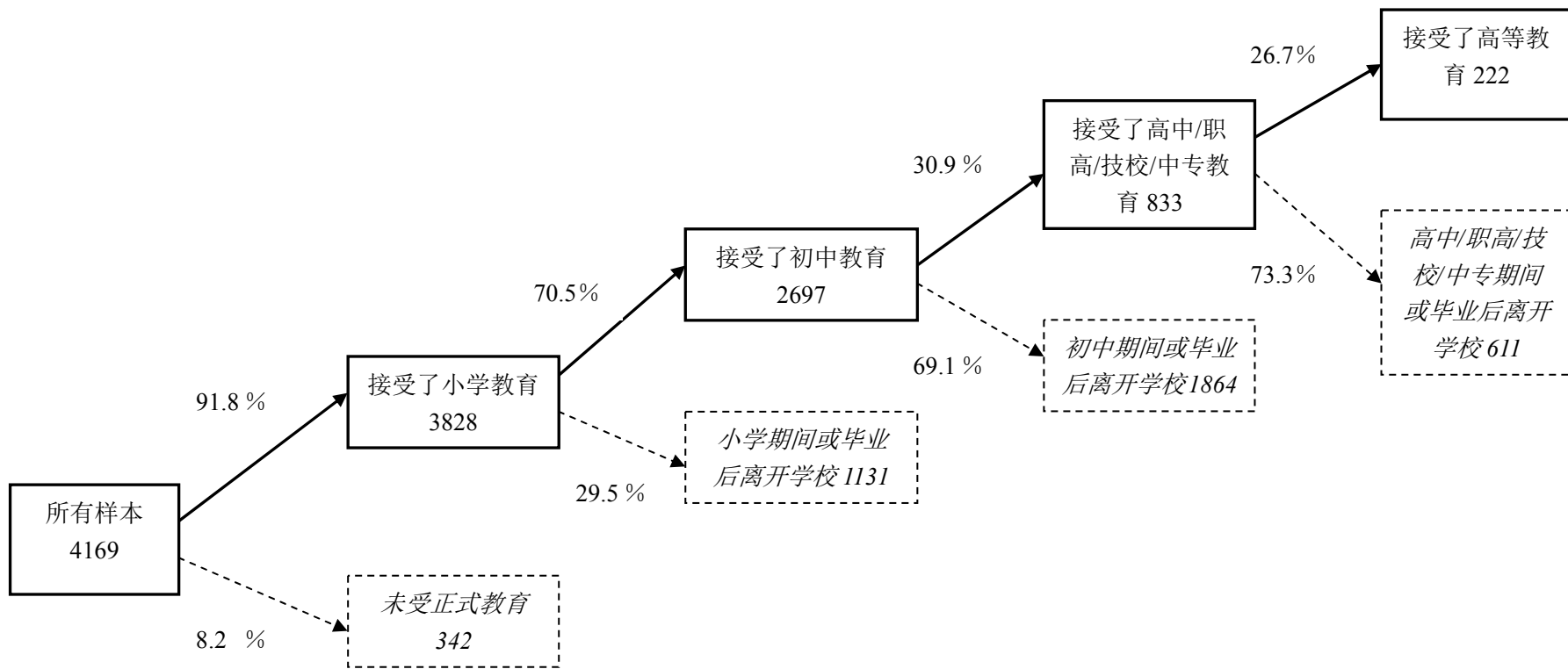
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
文革初期

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
文革中期

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
文革后期

60年代末期至80年代
文革后期及改革开放初期

图7 升学路径图（1960—1969年出生人群）



历史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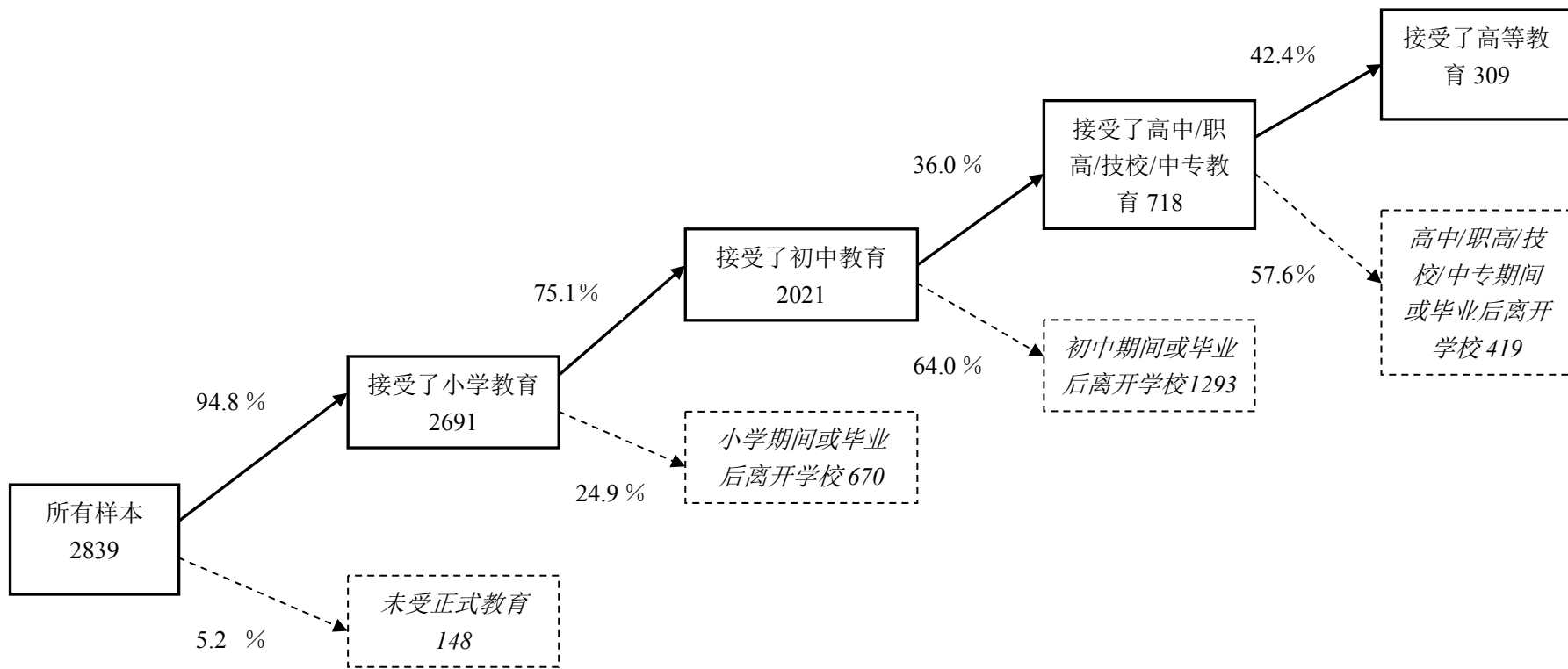
60年代末期至70年代
文革初期

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
文革后期及改革初期

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
文革后期及改革初期

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
改革初期

图 8 升学路径图（1970—1979 年出生人群）



历史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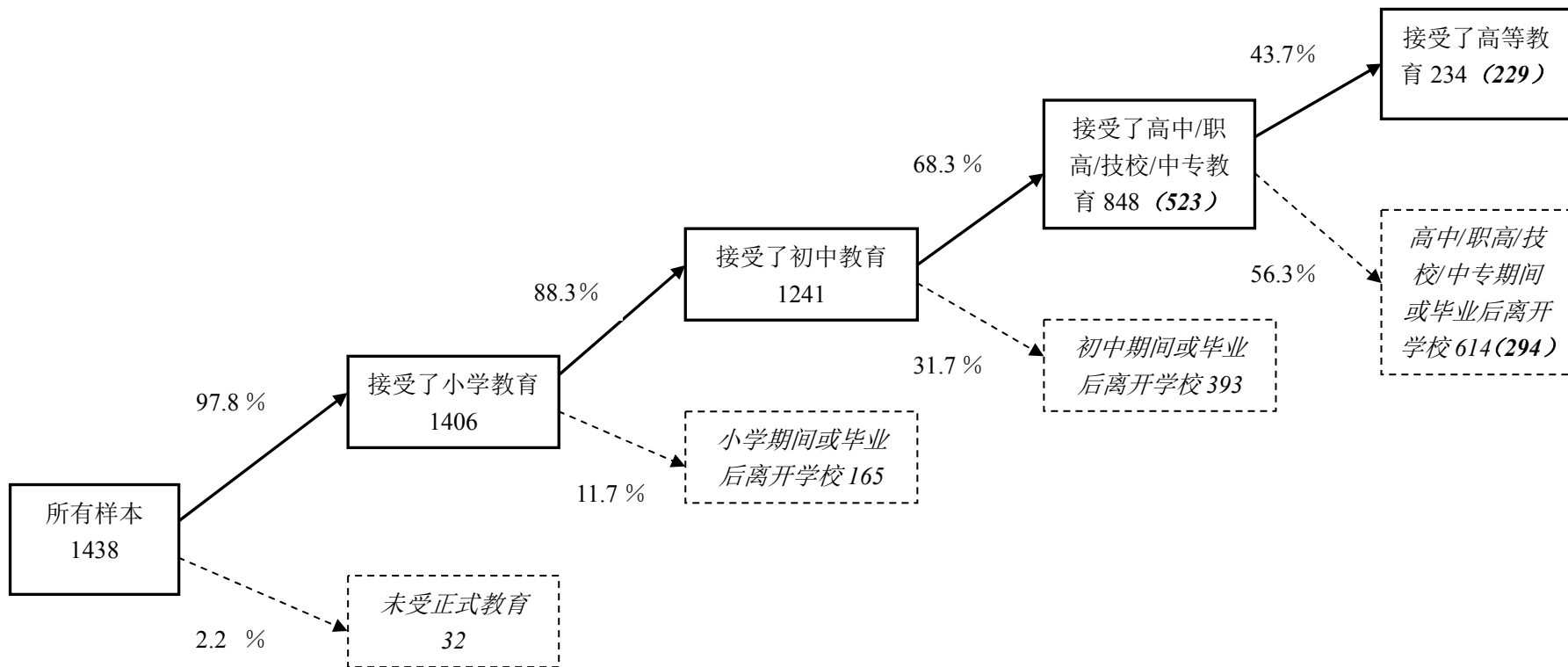
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
改革初期

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
改革初期

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
改革大规模推进

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
及21世纪初

图9 升学路径图（1980—1989年出生人群）



历史时期

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

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

90年代中期至2000年代中期

90年代末期至2000年代
大学扩招

注：1980—1989年出生人群中有一部分人在接受调查时没有达到上大学的年龄，在估计“接受了高中/职高/技校/中专教育”的人当中有多少比例“接受高等教育”时，排除了未达到上大学年龄的人，即2006年调查样本中1987年及以后出生的人和2008年调查样本中1989年及以后出生的人。比如：“接受了高中/职高/技校/中专教育”的人有848，但其中325人是1987年（2006年调查样本）和1989年（2008年调查样本）以后出生的人，在计算高级中等教育升入大学比率时只考虑符合年龄要求的523人。

不同年代出生的人，由于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中接受教育并经历了不同的历史事件，他们的升学路径和升学机会也有很大的不同。1940 年代出生的人是在解放初期接受小学教育，在 50 和 60 年代接受中等教育，在文革即将开始及文革初期接受高等教育（参见图 5 和表 2）。新中国建立以后，政府大力发展基础教育，40 年代出生人群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机会大大高于 1930 年代和 1920 年代的人（他们是在解放前渡过应该读小学时期），但是 1940 年代的人接受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机会并不多，当时中国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在接受调查的 2111 个 1940 年代出生的人当中，有 78.6% 的人进入正规的学校教育，另外的 21.4% 的人没有接受正规学校教育；1658 个进入正规学校教育的人当中，大约有一半人（51.1%）在达到小学教育水平以后就离开学校，另外的接近半数的人（48.9%）升入初中继续求学。进入初中的 811 人当中，绝大部分人（70%）在初中阶段或初中毕业后离开学校，只有 30% 的人继续升入高中、中专或职业中学。升入高中、中专或职业中学的 243 人当中，又有 71.6% 的人在高中阶段或高中毕业离开学校，仅剩 28.4% 的人（69 人）进入高等教育。如果以 2111 人的总体来计算，仅有 3.3% 的人有机会上大学。换句话说，在 20 世纪 60 年代（1940 年代出生人群应该上大学的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仅有 3.3%。

1950 年代出生的人在其成长期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文化大革命，文革对他们这一代的教育经历产生了严重的影响。1950 年代出生的人是在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接受小学教育，1966 年文革开始的时候正是他们接受初中教育以及由初中升入高中之时，文革期间的各种社会运动（如红卫兵运动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等）严重影响了他们接受高级中等教育的机会，他们中的许多人放弃了上高中的机会而参与各种社会运动，并且大部分人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文革期间的教育改革政策对高等教育产生了破坏性的冲击，高等教育机会增长停滞，导致 50 年代出生的人高中升大学的比例比 40 年代出生的人减少约 7 个百分点（参见表 2），而同时 50 年代出生的人初中升高中的比例则仅比 40 年代出生的人高不到 2 个百分点。50 年代出生的人小学升初中的比例虽然比 40 年代的人高很多，但由于文革的影响，他们所接受的初中教育的质量很低。在接受调查的 3239 人当中，82.6% 的人都有机会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另外的 17.4% 的人没有

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进入学校教育系统的 2676 人当中，略超过三分之一的人（34.9%）只接受了小学教育就离开了学校，其余接受三分之二的人（65.1%）升入初中；在升入初中的 1742 人当中，略超过三分之二的人（68.3%）在初中阶段或初中毕业后离开学校，不到三分之一的人（31.7%）继续升入高中、中专或职业中学；升入高中、中专或职业中学的 553 人当中，绝大部分人（79%）在高中阶段或高中毕业后离开学校，仅有 21% 的人进入大学学习（参见图 6）。如果按 3239 人的总体来计算，50 年代出生的人仅有 3.6% 的人有机会上大学，即 70 年代（50 年代出生的人应该上大学的时期）的大学毛入学率为 3.6%。

1960 年代出生的人是在文革期间接受小学教育，文革后期及改革开放的初期接受中等教育，在高考制度恢复以后接受高等教育。改革开放以及相应的教育制度改革对他们的教育经历产生了极大影响，一方面，高考制度恢复使一部分“60 后”有了上大学的机会，但另一方面，改革初期的市场化浪潮导致另一部分“60 后”（尤其是农村家庭子女）在中等教育阶段辍学而走向社会。因此，虽然“60 后”上大学的机会明显多于“50 后”，但初中升高中的比例却比“50 后”略低（参见表 2）。在接受调查的 4169 个“60 后”当中，91.8% 的人都有机会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只有 8.2% 的人没有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未接受正规教育的人的比例比“50 后”低 9 个百分点；进入学校教育系统的 3828 人当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人（70.5%）都升入了初中，剩下的不到三分之一的人（34.9%）只接受了小学教育就离开了学校；在升入初中的 2697 人当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人（69.1%）在初中阶段或初中毕业后离开学校，不到三分之一的人（30.9%）继续升入高中、中专或职业中学；升入高中、中专或职业中学的 833 人当中，绝大部分人（73.3%）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或毕业后离开学校，仅有 26.7% 的人进入大学学习（参见图 7）。如果按 4169 人的总体来计算，60 年代出生的人有 5.3% 的人有机会上大学，即 80 年代（60 年代出生的人应该上大学的时期）的大学毛入学率为约 5.3%，这一时期的大学毛入学率比 70 年代略有提高，这反映出改革开放初期阶段政府采取的恢复高等教育的政策增加了年轻人上大学的机会。

绝大多数的 1970 年代出生的人是在改革开始以后开始他们的教育经历的，他们在各阶段的升学机率都明显高于“60 后”，特别是上大学的机会增长明显（参见表 2）。在接受调查的 2839 个“70 后”当中，94.8% 的人都有机会接受正规的

学校教育，只有 5.2% 的人没有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未接受正规教育的人的比例进一步降低，比“60 后”低 3 个百分点；进入学校教育系统的 2691 人当中，有四分之三的人（75.1%）都升入了初中，剩下的四分之一的人（24.9%）只接受了小学教育就离开了学校；在升入初中的 2021 人当中，64% 的人在初中阶段或初中毕业后离开学校，其余 36% 继续升入高中、中专或职业中学；升入高中及其它高级中等教育的 728 人当中，有 42.4% 的人进入大学学习，其余 57.6% 的人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或毕业后离开学校（参见图 8）。如果按 2839 人的总体来计算，70 年代出生的人有 10.9% 的人有机会上大学，即 90 年代（70 年代出生的人应该上大学的时期）的大学毛入学率为约 10.9%，与前几代人相比，这一代人上大学的机会会有明显增长。

1980 年代出生的人的教育机会与前几代人相比进一步提高，这一代人普遍享有基础教育机会，初中教育也接近普及，高级中等教育机会与“70 后”相比有大幅度的提高。对于“80 后”来说，最幸运的一件事，就是在他们上大学的年龄期间有了大学扩招政策，高等教育机会供应量急速增加，从而导致这一代上大学的机会远远高于前几代人，“80 后”的大学毛入学率达到了 20.6%，比“70 后”的相应比例高了 10 个百分点。在接受调查的 1438 个“80 后”当中，97.8% 的人都有机会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只有 2.2% 的人没有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进入学校教育系统的 1406 人当中，绝大部分人（88.3%）都升入了初中，剩下约十分之一的人（11.7%）只接受了小学教育就离开了学校；在升入初中的 1241 人当中，68.3% 的人继续升入高中、中专或职业中学，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31.7%）放弃继续求学；升入高中、中专或职业中学的 848 人当中，有 43.7% 的人进入大学学习¹，其余 56.3% 的人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或毕业后离开学校（参见图 9）。如果按符合年龄条件的 1113 人²的总体来计算，80 年代出生的人有 20.6% 的人有机会上大学。这一比例与教育部公布的各年大学毛入率相符，教育部数据公布，90 年代末期大学扩招之前中国的大学毛入学率仅为 10% 左右，大学扩招政策实施以后其比例迅速上升，2005 年达到 19%，2006 年为 21%，2008 年为 23%，2009 年为 24.2%，目前应达到或超过 25%。

¹ 由于 2006 和 2008 年调查期间一部分未进入大学的“80 后”有可能在随后几年考入大学，因此“80 后”由高级中等教育升入大学的实际比例应该比 43.7% 更高。

² 调查数据中 80 后样本为 1438，其中 325 人是 1987 年（2006 年调查样本）和 1989 年（2008 年调查样本）以后出生的人，排队这 325 人，符合年龄条件的“80 后”样本为 1113，其中 229 人上了大学。

表 2 不同年龄组各阶段升学比例 (%)

年龄组	进入小学	小学升初中	初中升高级中等教育	高级中等教育升大学
1940—49	78.6	48.9	30.0	28.4
1950—59	82.6	65.1	31.7	21.0
1960—69	91.8	70.5	30.9	26.7
1970—79	94.8	75.1	36.0	42.4
1980—89	97.8	88.3	68.3	43.7
总体	88.9	69.4	34.6	32.2

注：高级中等教育包括高中、职高、技校、中专等；大学包括大本和大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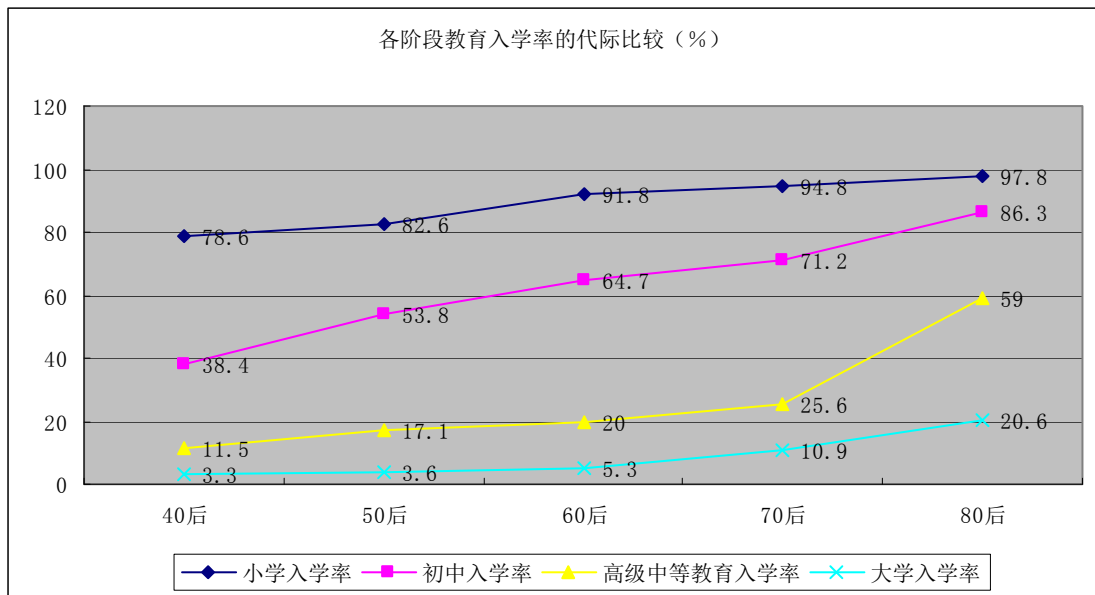


图 9

六、家庭背景对各阶段升学机率的影响

1、教育水平与家庭背景

通过前一部分对各阶段升学机率的数据描述，我们发现，在所有的 1940—1989 年出生的人群中，只有少数人能上大学，绝大多数的人（93.1%）没有上大学的机会。其中，96.7%的“40后”、96.4%的“50后”、94.7%的“60后”、89.1%的“70后”和 79.4%的“80后”没有上大学的机会。这些没有上大学的人是在升学的不同阶段被逐级淘汰，有些人完全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有些人在基础教育阶段被淘汰，有些在中等教育阶段被淘汰，有些人在大学门口被淘汰。那么，什么样的人最可能在最初阶段就被淘汰？什么样的人是在教育路径的途中

被淘汰？什么样的人最可能最终争取到上大学的机会？表 3 列出了不同教育水平的人的父亲的文化水平和职业。文化水平较低的人大多数来自农民家庭，其父亲大多数是文盲；而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更可能来自白领家庭，其父亲的文化水平也较高，绝大多数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的父亲拥有中等以上教育水平。不过，1940—1989 年出生的人的父亲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很少，仅有 2.1% 的接受过高等教育。其中，在拥有大学文化水平的人当中，12.7% 的人的父亲上过大学；拥有高中/中专/职高文化水平的人当中，6.9% 的人的父亲上过大学，拥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人当中，1.2% 的人的父亲上过大学；小学文化水平和未受教育的人当中，父亲上过大学的比例仅为 0.5% 和 0.3%。由此充分体现了家庭背景对个人教育机会的影响，父亲的文化水平和职业背景对子女的教育机会有着极大的影响，父亲的文化水平越高和职业地位越高，其子女越可能获得较高的教育水平。

表 3 不同教育水平的人的家庭背景

本人教育程度	15 岁时父亲教育水平 (%)				15 岁时父亲职业 (%)					
	未受教育	小学	初中	高中及以上	管理人员	专业人员	办事人员	个体自雇	工人	农民
未受正规教育	75.8	18.1	4.3	1.8	1.1	1.1	3.5	0.7	5.7	87.9
小学	58.8	32.0	6.5	2.7	1.5	2.0	3.9	1.2	9.4	82.1
初中	36.9	38.8	17.7	6.6	2.8	3.5	7.7	1.8	22.5	61.7
高中/职高/中专	20.7	31.6	25.0	22.7	8.9	9.1	11.8	3.2	31.9	35.2
大学及以上	11.5	24.7	26.5	37.3	13.1	13.3	12.9	3.8	30.0	26.9

2、家庭背景对不同阶段升学机率的影响

毫无疑问家庭背景是影响个人教育机会的重要因素，但是这种影响在升学的不同阶段也可能强弱程度不同或影响的方面不同。本研究通过 Conditional Logit Regression 模型，考查家庭背景因素对不同阶段的升学机会的影响，模型的因变量是各阶段入学概率——“是否进入小学”、“是否由小学升入初中”、“是否由初中升入高中/职高/中专”、“是否由高中/职高/中专升入大学”，自变量包括了“父亲文化水平”、“父亲职业”、“父亲户口”，控制变量为“性别”。表 4 列出了模型的统计结果。

(1) 家庭背景对进入小学机率的影响

表 4 的数据显示，父亲文化水平和户口身份对子女是否接受正规教育具有显

著影响，但父亲职业的影响则不明显。父亲文化水平越高，子女越可能进入小学学习。父亲为小学文化的人，上学的机会是父亲为文盲的人的 3.5 倍；父亲为初中文化的人，上学的机会是父亲为文盲的人的 5.6 倍；父亲为高中及以上文化的人，上学的机会是父亲为文盲的人的 5.2 倍。父亲具有城镇户口的人，上学的机会是父亲为农村户口的 4.3 倍。另外，性别也是影响教育机会的重要因素，男性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是女性的 3 倍。这说明，大多数未接受正规教育的人的父亲是文盲或很低的文化水平，而且大多数未接受正规教育的人是女性。

（2）家庭背景对小学升初中机率的影响

表 4 的数据显示，父亲文化水平、父亲职业和父亲户口身份都对子女是否能由小学升入初中具有显著影响。父亲文化水平越高，子女越可能升入初中学习。父亲为小学文化的人，升入初中的机会是父亲为文盲的人的 1.9 倍；父亲为初中文化的人，升入初中的机会是父亲为文盲的人的 4.4 倍；父亲为高中及以上文化的人，升入初中的机会是父亲为文盲的人的 4.6 倍。父亲职业为“管理人员”的人，升入初中的机会是父亲为农民的人的 1.7 倍；父亲职业为“办事人员”的人，升入初中的机会是父亲为农民的人的 1.5 倍；父亲职业为“工人”的人，升入初中的机会是父亲为农民的人的 1.6 倍。令人吃惊的是，父亲职业为“专业人员”的人，其子女升入初中的机率与父亲为农民的人没有明显差异，这主要是因为专业人员群体中有大量农村专业人员，比如乡村教师、乡村医生或乡村农机人员，他们的子女的教育机会与农民差异不大。父亲职业为“个体/自雇”的人，升入初中的机会也与父亲为农民的人差异不明显。父亲具有城镇户口的人，升入初中的机会是父亲为农村户口的人的 2.9 倍。另外，性别也影响了小学升入初中的机会，男性升入初中的机会是女性的 1.4 倍。

（3）家庭背景对初中升入高级中等教育机率的影响

表 4 的数据显示，父亲文化水平和户口身份对子女是否能由初中升入高级中等教育具有显著影响，而父亲职业则具有部分影响。父亲文化水平越高，子女越可能升入高级中等教育。父亲为小学文化的人，升入高级中等教育的机会是父亲为文盲的人的 1.3 倍；父亲为初中文化的人，升入高级中等教育的机会是父亲为文盲的人的 2.1 倍；父亲为高中及以上文化的人，升入高级中等教育的机会是父亲为文盲的人的 3.7 倍。父亲具有城镇户口的人，升入高级中等教育的机会是父

亲为农村户口的 2.5 倍。在父亲职业的影响方面，专业人员、办事人员和工人的子女升入高级中等教育的机会与农民子女的差异不明显，但管理人员和个体/自雇人员的子女升入高级中等教育的机会则明显多于农民子女。父亲职业为“管理人员”的人，升入高级中等教育的机会是父亲为农民的人的 2 倍；父亲职业为“个体/自雇”的人，升入高级中等教育的机会是父亲为农民的人的 1.4 倍。另外，男性升入高级中等教育的机会是女性的 1.2 倍。

（4）家庭背景对由高级中等教育升入大学机率的影响

表 4 的数据显示，父亲文化水平和户口身份对子女是否能由高级中等教育升入大学具有显著影响，而父亲职业的影响则非常微弱。父亲文化水平越高，子女越可能升入大学。父亲为小学文化的人，升入大学的机会是父亲为文盲的人的 1.4 倍；父亲为初中文化的人，升入大学的机会是父亲为文盲的人的 2.2 倍；父亲为高中及以上文化的人，升入大学的机会是父亲为文盲的人的 4.3 倍。父亲具有城镇户口的人，升入大学的机会是父亲为农村户口的 1.6 倍。在父亲职业的影响方面，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办事人员和个体/自雇人员的子女升入大学的机会与农民子女的差异不明显，仅有工人的子女升入大学的机会明显少于农民子女。父亲职业为“工人”的人，升入大学的机会仅是父亲为农民的人的 73%。另外，男性升入大学的机会与女性并无明显差异。

基于比较分析家庭背景对各阶段升学机率的影响，我们发现，父亲文化水平对子女的各个阶段的升学机会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尤其对进入小学学习、小学升入初中这两个升学阶段的影响更为突出，而父亲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对于子女升入大学机会的影响也很大。这说明，没有教育机会的人或只达到小学文化水平的人大多来自父亲文化水平极低（如父亲未接受正规教育）的家庭。父亲的户口身份区分了城乡的差异，父亲拥有城镇户口表明其子女来自城镇家庭并在城镇接受教育，而父亲拥有农村户口则表明其子女来自农村家庭并在农村地区开始教育经历。城乡分割因素对各阶段的升学机会都有极大影响，城镇家庭子女在各个阶段的升学过程中都具有更多的机会，但这种影响随着升学阶段的提高而逐步下降，越低的升学阶段，城乡差异越大，较高的升学阶段，城乡差异有所缩小，比如，在进入小学阶段，城乡差距是 4.3 倍，在小学升初中阶段，城乡差距是 2.9 倍，在初中升入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城乡差距是 2.5 倍，在高级中等教育升

入大学阶段，城乡差距是 1.6 倍。这说明，农村家庭子女在初级和中等教育阶段需要克服的障碍更多，一旦完成了高级中等教育，他们考入大学的机会与城镇家庭子女的差距有明显缩小。父亲职业对升学机率的影响要小于父亲文化水平和户口身份，它对初等教育机会没有明显影响，但对小学升入初中的影响则十分明显，不过，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农民与其它职业之间的差异上，农民子女的教育机会少于其它职业从业者子女，而其它各类职业之间的差异不明显。到了升入高级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父亲职业的影响很微弱。性别对各阶段升学机会的影响有些类似于父亲户口身份，在初级的升学阶段，性别因素的影响更明显，随着升学阶段的提高，性别之间的差距在缩小，比如，在进入小学阶段，男女的差距是 3 倍，在进入初中阶段，男女的差距是 1.4 倍，在升入高级中等教育阶段，男女的差距是 1.2 倍，在升入大学阶段，男女之间无明显差异。

3、各阶段升学机率的代际差异

表 4 所列 Conditional Logit Regression 的升学模型加入出生年龄组自变量，其回归系数显示了不同年龄组人群的各阶段升学机率。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教育扩张使人们的各个阶段教育机会都不断提高。从代际比较来看，小学教育机会的增长最明显，50 年代出生的人上小学的机会是 40 年代出生的人的 1.2 倍，60 年代出生的人上小学的机会是 40 年代出生的人的 2.9 倍，70 年代出生的人上小学的机会是 40 年代出生的人的 4.1 倍，80 年代出生的人上小学的机会是 40 年代出生的人的 7.2 倍。小学升初中的机会也明显增长，特别是 80 年代出生的人升入初中的机会比前几代人有大幅提高。50 年代出生的人上初中的机会是 40 年代出生的人的 1.8 倍，60 年代出生的人上初中的机会是 40 年代出生的人的 2.5 倍，70 年代出生的人上初中的机会是 40 年代出生的人的 2.8 倍，80 年代出生的人上初中的机会是 40 年代出生的人的 5.6 倍。初中升入高中的机会增长不太大，50 年代、60 年代和 70 年代出生的人升入高中的机会与 40 年代出生的人差异不大，只有 80 年代出生的人机会增长明显，80 年代出生的人升入高中的机会是前几代人的 1.8 倍。上大学的机会增长更小于上高中的机会增长³。

³ 由于数据中的上大学的个案数较少，尤其是一部分 80 年代出生的人在 2006 年调查时还未达到上大学的年龄，模型对上大学机会的代际变化的测量不够准确。

七、各阶段教育机会不平等的代际变化

表 6 的 Conditional Logit Regression 模型是在控制了相关变量的情况下，通过交互效应变量，考察家庭背景因素和城乡因素对各阶段教育获得的影响是否发生了变化。但由于模型中控制变量和交互变量很多，而样本规模不够大，导致大多数的交互项回归系数不显著，无法准确判断不同代际之间是否发生了变化。为此，作者在各模型中分别取消了部分控制变量和交互项（减少自由度），只估计某一个交互项的比率比的代际差异（参见图 10—17）。综合上述两部分数据分析结果，判断是否存在代际的变化。之前部分的数据分析显示，影响各阶段教育获得的因素是父亲的文化水平和父亲的户口身份，因此下述数据分析主要考察这两方面的因素对各出生年龄组人群的教育获得的影响是否有变化。

1. 父亲文化水平的影响

图 10—13 显示的是父亲文化水平对子女各阶段教育获得的影响的代际变化（未加控制变量）。在小学教育阶段（图 10），父亲文化水平的影响变化显示出曲线性的变化。父亲文化水平对 50 年代和 60 年代出生的人（在经济改革之前接受小学教育）的影响逐渐缩小，而对 70 年代的人（在 80 年代或在经济改革最初十年接受小学教育）的影响骤然上升，但对 80 年代出生的人（90 年代接受小学教育）的影响又有所下降，但影响水平仍然高于经济改革之前。这一结果与加入控制变量的模型分析结果（表 6）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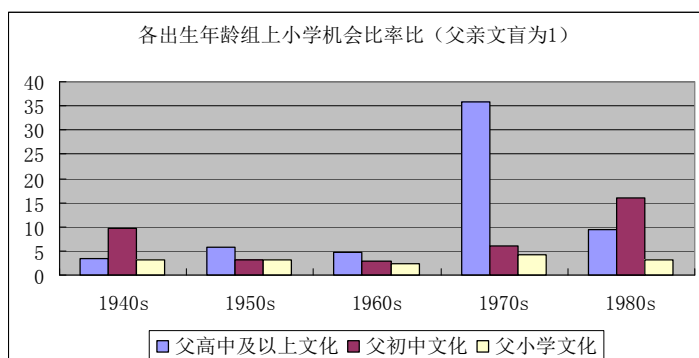


图 10

图 11 显示，父亲文化水平对升入初中的影响的代际变化与小学教育相似，也呈现出先下降（经济改革之前）后上升（经济改革之后），然后又有略微下降。控制变量的模型分析结果（表 6）虽然显示了先下降后上升的相同趋势，但对于最近期的影响（对 80 年代出生的人的影响）则与未加控制变量的分析结果相反，

其数据分析结果是父亲文化水平的影响继续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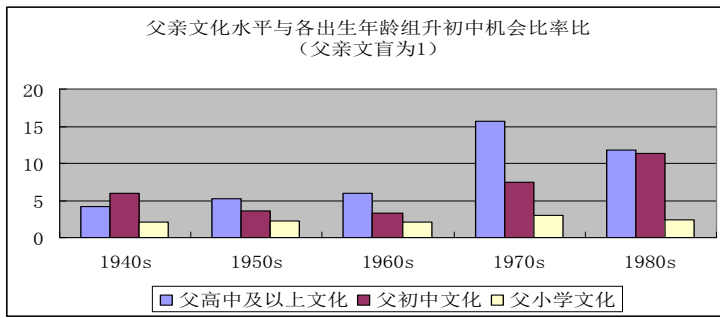


图 11

图 12 显示，父亲文化水平对升入高中的影响的代际变化趋势也是先有略微下降（经济改革之前）之后上升（经济改革之后），然后又有所下降。控制变量的模型分析结果（表 6）与此相类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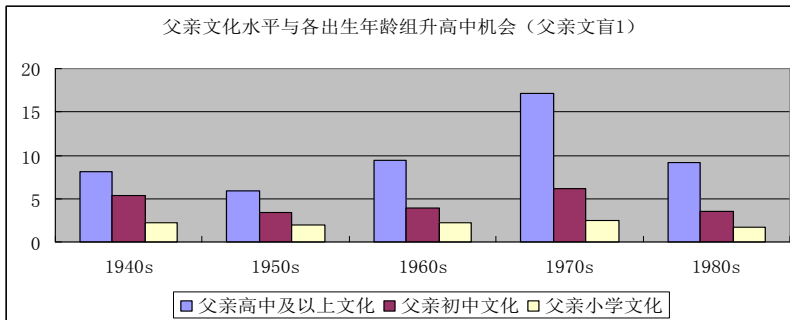


图 12

图 13 显示，对于各个代际人群，父亲文化水平对上大学机会的影响都很大，这种影响在经济改革之前只有轻微的下降，但经济改革以来影响作用上升明显，最近十年又有所下降。控制变量的模型分析结果（表 6）与此相类似，尽管回归系数都不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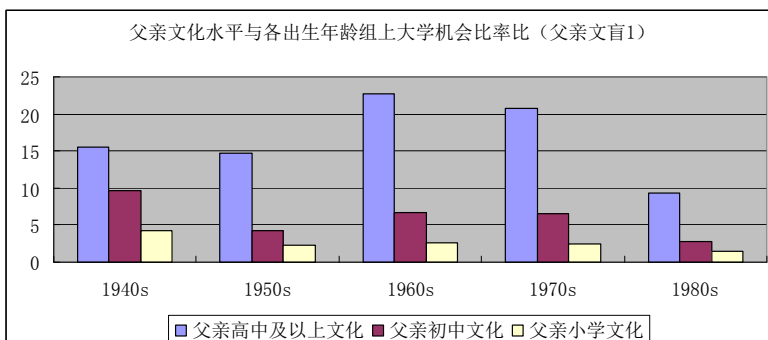


图 13

2. 父亲户口的影响

图 14 显示，城乡因素对于小学教育机会的影响对 50 和 60 年代出生的人（在

50 和 60 年代接受小学教育) 影响很大。经济改革以来城乡差异明显减弱。这一结果与加入控制变量的模型分析结果 (表 6) 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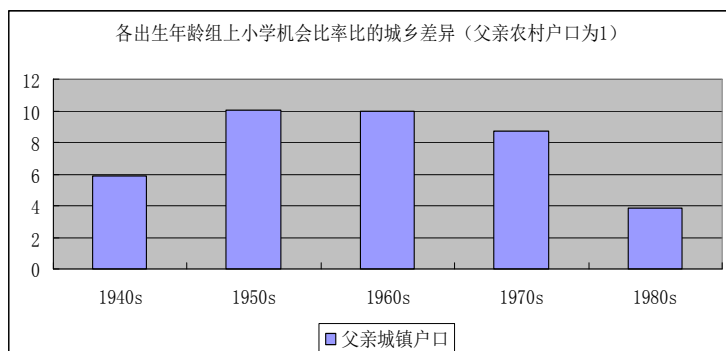


图 14

图 15 显示, 城乡因素对于升入初中机会的影响持续上升, 直到 90 年代城乡差异才有所缩小 (80 年代的人上初中时)。这一结果与加入控制变量的模型分析结果 (表 6) 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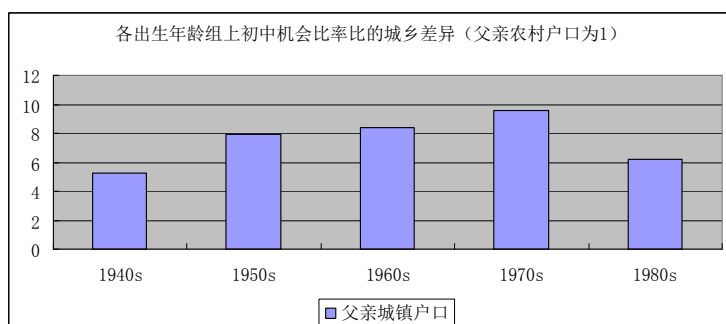


图 15

图 16 显示, 上高中机会的城乡差异只有在文革时期 (50 年代出生的人上高中的时期) 有略微下降, 之后持续上升, 90 年代后期和本世纪初期 (80 年代出生的人上高中的时期) 有所下降。加入控制变量的模型对近期城乡差异变化趋势的分析结果与此不同, 表 6 数据显示, 上高中机会的城乡差异持续上升而没有下降。60 年代出生于城镇的人上高中的机会是农村人的 2 倍, 70 年代出生的城镇人上高中的机会是农村人的 2.5 倍, 而 80 年代出生的城镇人上高中的机会是农村人的 3.4 倍。

上大学机会的城乡差异分析结果与高中机会分析结果相似。图 17 显示, 上大学机会的城乡差异持续上升, 直到最近十年 (80 年代出生的人上大学的时期) 才有所下降。而加入控制变量的模型对近期城乡差异变化趋势的分析结果则有所不同, 其回归系数显示, 城乡差异仍在扩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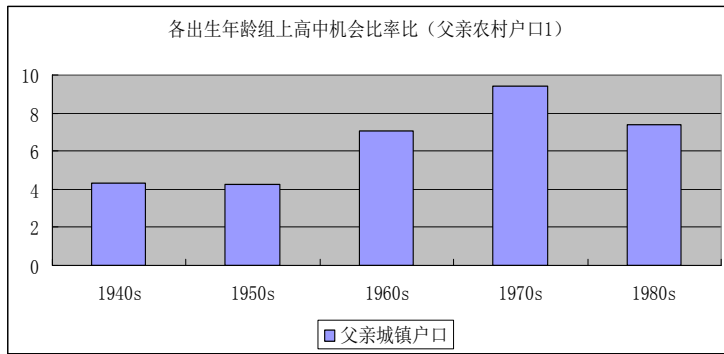


图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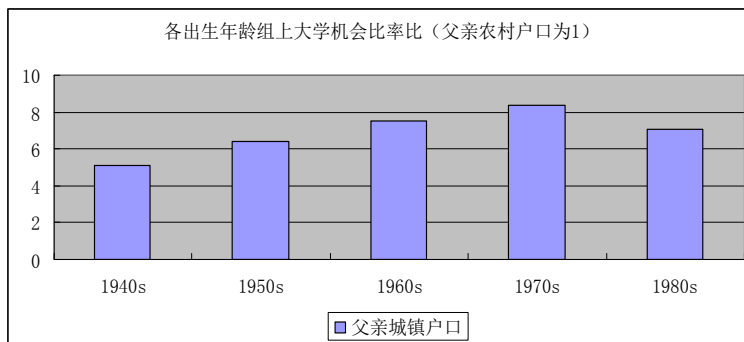


图 17

八、结论

基于数据分析，我们发现近 60 年中国教育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并未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逐步下降，教育不平等的变化轨迹是随着社会结构中阶级不平等的变化而升降，阶级不平等的变化则是由于国家政策的重大改变而导致的。这些经验分析结果否定了工业化理论有关教育不平等变化趋势的假设，同时验证了再生产理论的相应观点，即教育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和下降取决于社会结构中的阶级差异的扩大和缩小。文凭主义假设获得了一定的支持，教育扩张（初等教育和初级中等教育普及）的确使这两个阶段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明显下降，而高级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不平等程度下降则较为困难。即使最近十年里这两个较高阶段的教育机会迅速增长，但仍未能明确这两个阶段的教育不平等有所下降。另外，数据分析结果还显示，家庭文化资本（父亲教育水平）和城乡差异是导致中国的教育不平等的重要因素。

表 4 对各阶段升学机会影响因素的分析 (Conditional Logit Regression)

自变量	进入小学			小学升初中			初中升高级中等教育			高级中等教育升大学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比率比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比率比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比率比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比率比
性别 (男性)	1.083***	.062	2.952	.301***	.043	1.351	.170***	.049	1.185	.123	.083	1.131
父亲教育水平 (参照组: 未受正规教育)												
高中及以上	1.652***	.208	5.218	1.523***	.116	4.584	1.313***	.089	3.717	1.458***	.146	4.297
初中	1.717***	.130	5.566	1.490***	.077	4.437	.730***	.071	2.076	.804***	.136	2.233
小学	1.208***	.072	3.348	.635***	.047	1.886	.270***	.063	1.310	.365**	.133	1.440
15 岁时父亲职业 (参照组: 农民)												
管理人员	.153	.257	1.165	.514***	.158	1.673	.678***	.127	1.969	.185	.188	1.203
专业人员	.108	.274	1.114	.037	.147	1.037	.220	.124	1.246	-.086	.191	.918
办事人员	.079	.155	1.082	.402***	.104	1.496	.129	.099	1.138	-.224	.176	.799
个体/自雇	.644	.354	1.904	.394	.183	1.483	.355*	.163	1.426	.110	.251	1.116
工人	.349*	.139	1.418	.507***	.086	1.660	.051	.085	1.053	-.318*	.156	.727
父亲户口 (城镇户口)	1.449***	.149	4.257	1.061***	.083	2.890	.910***	.076	2.485	.451***	.138	1.569
常数项	.815***	.041	2.259	-.214***	.039	.807	-1.634***	.059	.195	-1.664***	.125	.189
样本数	13796			12259			8512			2946		

显著水平: *** \leq .005; ** \leq .01; * \leq .05

表 5 对各阶段升学机会影响因素的分析 (Conditional Logit Regression, 加入年龄组控制变量)

自变量	进入小学			小学升初中			初中升高级中等教育			高级中等教育升大学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比率比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比率比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比率比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比率比
性别 (男性)	1.190***	.064	3.288	.370***	.044	1.448	.174***	.049	1.190	.138	.084	1.148
父亲教育水平 (参照组: 未受正规教育)												
高中及以上	1.043***	.212	2.839	1.073***	.121	2.923	1.068***	.095	2.909	1.182***	.159	3.261
初中	1.097***	.136	2.996	1.088***	.081	2.968	.518***	.077	1.678	.541***	.147	1.717
小学	.939***	.074	2.556	.465***	.048	1.592	.192***	.064	1.212	.242	.136	1.274
15 岁时父亲职业 (参照组: 农民)												
管理人员	.185	.261	1.203	.536***	.160	1.709	.731***	.127	2.077	.255	.190	1.291
专业人员	.278	.276	1.321	.194	.149	1.215	.316*	.126	1.371	-.002	.194	.998
办事人员	.130	.157	1.139	.425***	.105	1.530	.172	.100	1.188	-.188	.178	.829
个体/自雇	.417	.361	1.517	.243	.188	1.276	.197	.165	1.217	-.010	.253	.990
工人	.248	.145	1.281	.444***	.088	1.560	.025	.085	1.025	-.319*	.157	.727
父亲户口 (城镇户口)	1.695***	.153	5.449	1.256***	.085	3.511	1.006***	.078	2.733	.517***	.140	1.676
年龄组 (参照组: 1940—49)												
1950—59	.135	.076	1.145	.570***	.069	1.768	-.042	.098	.959	-.495**	.183	.610
1960—69	1.069***	.083	2.913	.923***	.066	2.517	-.010	.093	.990	-.314	.170	.730
1970—79	1.420***	.106	4.139	1.038***	.074	2.824	.157	.098	1.170	.296	.171	1.344
1980—89	1.979***	.197	7.239	1.722***	.106	5.596	.586***	.109	1.796	.125	.181	1.133
常数项	.235***	.065	1.265	-.939***	.064	.391	-1.688***	.096	.185	-1.488	.179	.226
样本数	13796			12259			8512			2946		

表 6 对各阶段升学机会影响因素的年龄组比较分析 (Conditional Logit Regression)

自变量	进入小学			小学升初中			初中升高级中等教育			高级中等教育升大学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比率比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比率比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比率比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比率比
性别 (男性)	1.131***	.117	3.100	.416***	.107	1.516	.140	.165	1.150	.477	.324	1.611
父亲教育水平 (参照组: 未受正规教育)												
高中及以上	.536	.467	1.709	.645	.338	1.905	1.343***	.384	3.832	1.061	.599	2.891
初中	1.833***	.542	6.254	.965***	.264	2.626	.694*	.284	2.002	.757	.510	2.131
小学	1.003***	.156	2.726	.272*	.118	1.313	.308	.181	1.361	.856*	.363	2.354
15 岁时父亲职业 (参照组: 农民)												
管理人员	.135	.642	1.144	.391	.396	1.478	-.111	.486	.895	-.226	.906	.798
专业人员	.805	.621	2.237	.070	.322	1.073	.497	.411	1.643	.672	.720	1.958
办事人员	-.112	.341	.894	.699*	.290	2.013	-.481	.389	.618	.247	.753	1.280
个体/自雇	.018	.587	1.018	.413	.417	1.512	-.042	.530	.959	-.108	1.099	.897
工人	.047	.287	1.049	.237	.221	1.268	-.046	.319	.955	-.161	.645	.851
父亲户口 (城镇户口)	1.489***	.295	4.432	1.057***	.205	2.877	.417	.297	1.518	.177	.610	1.194
年龄组 (参照组: 1940—49)												
1950—59	.013	.109	1.013	.516***	.128	1.676	.050	.209	1.051	-.215	.471	.806
1960—69	1.127***	.116	3.086	.770***	.119	2.160	-.489*	.201	.613	-.047	.449	.954
1970—79	1.222***	.149	3.394	.669***	.135	1.951	-.604**	.231	.547	.978*	.470	2.659
1980—89	1.795***	.341	6.018	1.322***	.226	3.750	.450	.298	1.569	1.127*	.573	3.088
年龄组 X 男性												
"1950-59"X 男性	.285	.159	1.330	-.048	.140	.953	-.032	.197	.968	-.236	.393	.789
"1960-69"X 男性	-.090	.175	.914	-.009	.132	.991	.039	.188	1.040	-.130	.365	.878

"1970-79"X 男性	-.044	.238	.957	-.126	.146	.881	.119	.196	1.126	-.429	.359	.651
"1980-89"X 男性	-.690	.393	.501	-.220	.206	.803	-.146	.208	.864	-.650	.369	.522
年龄组 X15 岁时父亲文化水平												
"1950-59"X 高中及以上	.398	.610	1.488	.057	.428	1.058	-.493	.445	.611	.041	.707	1.042
"1950-59"X 初中	-1.302*	.592	.272	-.362	.326	.697	-.246	.335	.782	-.593	.627	.553
"1950-59"X 小学	-.104	.204	.901	-.019	.154	.981	-.156	.219	.856	-.776	.458	.460
"1960-69"X 高中及以上	.159	.607	1.173	.097	.404	1.102	-.373	.422	.689	.592	.669	1.807
"1960-69"X 初中	-1.061	.591	.346	-.298	.299	.742	-.171	.318	.843	.180	.581	1.197
"1960-69"X 小学	-.220	.208	.803	.246	.145	1.279	.061	.212	1.063	-.574	.442	.563
"1970-79"X 高中及以上	2.359*	1.042	10.583	1.043*	.431	2.838	-.015	.438	.985	-.024	.684	.976
"1970-79"X 初中	-.232	.619	.793	.657*	.306	1.930	.100	.332	1.105	-.354	.593	.702
"1970-79"X 小学	.331	.258	1.393	.593***	.160	1.809	.006	.245	1.006	-.842	.473	.431
"1980-89"X 高中及以上	1.091	.845	2.979	1.240*	.493	3.455	-.517	.478	.596	-.618	.761	.539
"1980-89"X 初中	.697	.843	2.007	1.126**	.382	3.083	-.473	.383	.623	-.963	.686	.382
"1980-89"X 小学	.013	.441	1.013	.437	.253	1.548	-.370	.320	.691	-1.031	.599	.357
年龄组 X15 岁时父亲职业												
"1950-59"X 管理人员	.421	.782	1.524	.430	.490	1.537	.910	.553	2.485	.729	1.041	2.074
"1950-59"X 专业人员	-.480	.800	.619	.282	.440	1.326	-.072	.501	.930	-.282	.911	.754
"1950-59"X 办事人员	.332	.424	1.394	-.137	.352	.872	.680	.451	1.974	-.038	.899	.963
"1950-59"X 个体/自雇	1.105	1.123	3.019	-.346	.644	.708	-.804	.896	.448	.913	1.829	2.492
"1950-59"X 工人	.323	.391	1.381	.672*	.292	1.959	.282	.380	1.326	.005	.801	1.005
"1960-69"X 管理人员	-.257	.775	.773	.165	.481	1.179	1.036	.533	2.819	.592	.974	1.808
"1960-69"X 专业人员	-.858	.760	.424	.362	.418	1.435	-.009	.467	.991	-.678	.810	.508
"1960-69"X 办事人员	.436	.463	1.546	-.112	.340	.894	.730	.425	2.075	-.487	.829	.614
"1960-69"X 个体/自雇	1.079	1.415	2.941	-.811	.604	.444	-.083	.738	.920	1.112	1.399	3.041

"1960-69"X 工人	.076	.402	1.079	.320	.276	1.377	.055	.358	1.057	-.209	.725	.812
"1970-79"X 管理人员	-.534	.947	.586	.246	.609	1.279	1.172*	.556	3.229	.453	.969	1.572
"1970-79"X 专业人员	-.651	1.136	.522	.091	.492	1.096	-.305	.480	.737	-.993	.801	.370
"1970-79"X 办事人员	.020	.596	1.020	-.514	.380	.598	.782	.439	2.186	-.432	.822	.649
"1970-79"X 个体/自雇	-.318	.845	.727	.170	.581	1.185	.533	.624	1.703	.444	1.207	1.560
"1970-79"X 工人	.341	.520	1.406	-.205	.287	.815	.242	.364	1.274	-.054	.709	.947
"1980-89"X 管理人员	17.123	6.315E3	2.732E7	-.493	.839	.611	.408	.662	1.504	.583	1.030	1.791
"1980-89"X 专业人员	16.255	6.017E3	1.146E7	17.766	5.928E3	5.198E7	-.352	.577	.703	-.513	.852	.599
"1980-89"X 办事人员	.410	1.099	1.507	-1.479**	.508	.228	.709	.493	2.031	-.512	.843	.599
"1980-89"X 个体/自雇	17.380	4.050E3	3.533E7	-.183	.599	.833	.351	.594	1.420	-.163	1.159	.849
"1980-89"X 工人	.724	.760	2.063	-.039	.355	.961	-.099	.370	.906	-.176	.709	.839
年龄组 X15 岁时父亲城镇户口												
"1950-59"X 城镇户口	.397	.396	1.487	-.029	.267	.971	-.176	.353	.839	.365	.747	1.440
"1960-69"X 城镇户口	.530	.447	1.699	.357	.260	1.428	.691*	.330	1.996	.040	.677	1.041
"1970-79"X 城镇户口	-.064	.576	.938	.643*	.299	1.903	.904**	.336	2.470	.212	.662	1.237
"1980-89"X 城镇户口	-1.434	.869	.238	.233	.423	1.262	1.218***	.350	3.379	.761	.662	2.141
常数项	.278***	.082	1.320	-.815***	.099	.443	-1.348***	.173	.260	-1.893***	.376	.151
样本数	13796			12259			8512			2946		

显著水平: *** \leq .005; ** \leq .01; * \leq .05

参考文献

- 李春玲：“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3期
- 李春玲：“教育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妇女研究论丛》2009年第1期
- 李春玲：“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 李煜：“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1966—2003）”，《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 刘精明：“中国基础教育领域中的机会不平等及其变”《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 刘精明：《国家、社会阶层与教育：教育获得的社会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 陆学艺、李培林主编：《中国社会发展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
- 蒋中一、戴洪生：《降低农村初中辍学率和义务教育体制的改革》，《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4期。
- 欧贤才、王凯：《自愿性辍学：新时期农村初中教育的一个新问题》，《中国青年研究》2007年第5期；
- Bourdieu, P. 1977. “Cultural and Social Reproductions.” Pp. Power and Ideology in Education, edited by J. Karabel and A.H. Halse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wles, S., and H. Gintis. 1976. *Schooling in Capital American*. New York: Basic Books.
- Carnoy, M. 1974. *Education as Cultural Imperialism*. New York: David McKay.
- Collins, R. 1971. “Functional and Conflict Theories of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6:1002-1019.
- Collins, R. 1979. *The Credential Society: An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nd Stratifica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Featherman, D. L., and R. M. Hauser. 1978. *Opportunity and Chang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Garnier, M. A. and L. E. Raffalovich. 1984. “The Evolution of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in Franc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57:1-11.
- Haller, M. 1981. *Egalisierung der chancen oder statusreproduktion?* Vienna, Austria: Institut Fur Hohere Studien.
- Halsey, A. H. 1975. “Educational and Social Mobility in Britain since World War II.” Pp.501-559 in *Education, Inequality and Life Changes*. Paris, Franc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 Development.
- Halsey, A. H., A. F. Heath, and J. M. Ridge. 1980. *Origins and Destinations: Family, Class and Education in modern Britain*. Oxford, England: Clarendon Press.
- Karabel, J. 1972. “Community College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Harvard Education Review* 42:521-562.
- Lenski, G. E. 1966. *Power and Privilege: A Theor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
- Mare, R. D. 1981. “Change and Stability in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6:72-87.
- Shavit, Yossi and Vered Kraus. 1990. “Educational Transitions in Israel: A Test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Credentialism Hypothese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Vol.63,

No.2, pp.133-141.

Shavit, Y. 1984. "Tracking and Ethnicity in Israeli Secondary Edu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210-220.

Simkus, A., and R. Andorka. 1982.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Hunga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7:740-751.

Smith, H. L., and P. L. Cheung. 1986. "Trends in the Effects of Family background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Philippin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1387-1408.

Treiman, D.J. 1970. "Industrializatio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Pp. 204-234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for the 1970s*, edited by E. O. Laumann. New York: Bobbs-Merrill Co.